·专题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6.020

论加里·斯奈德英译寒山诗的生生特性

刘艳芬,王雪霏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加里·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对寒山诗的创造性翻译,融合了古老的东方生态智慧与现代的西方生态意识,展现出寒山诗的生生特性。寒山诗特别是斯奈德选择翻译的隐逸诗、道教诗与佛禅诗,蕴含着深刻的道、禅哲思,表现为多个灵动意象的动态共生。水、云、月和山、岩、石等多种意象以更具生机活力的松、林意象为中介,建构了鲜活动人的审美空间,成为生生之美转化的源头活水;基于此,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实践不仅体现出西方现代生态哲学中对野性生命力的召唤,而且融合了天人合一的东方生态智慧,表现出中国唐代生态思想的异质延展;译文通过语义重组、审美重塑激发了读者的生态想象,在跨文化语境中完成生态意义的再生,最终呈现出翻译实践中的生生之境。斯奈德对寒山诗的英译,不仅是语义层面的转写,更是生生美学与文化交流的深度互文,为传统中国诗学中的生生思想注入当代表达。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寒山诗;生态诗学;生生特性

[中图分类号]I046;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6-0186-09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是20世纪以来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其思维方式深受东方哲学智慧的影响。他青年时期所处的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美国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物质欲望泛滥,导致青年人生活压抑、精神匮乏。斯奈德在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时,将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智慧,尤其是唐代诗人寒山"浪造山林中,独卧盘陀石"①的隐居生活,以及诗中所描述的"栖迟寒岩下"②的生存方式,正契合其精神上的需要。他希望借助东方古老诗歌及其精神资源,为当代西方个体探索自由而本真的生命状态提供新的思想路径。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机缘,斯奈德于20世纪50年代对寒山诗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并将其中的生态意识进行巧妙转换,从而促成了"寒山热"在美国的兴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斯奈德从意象表达与审美趣味等多个层面重构寒山诗中的生态意涵,使得寒山诗中的幽冷意象被激活为充满生命张力的野性之境,并将寒山诗中的"天人合一"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从而将其中的东方生态意蕴引向西方语境并加以重构和创生,体现了生态精神的跨文化生成,展现出鲜明的生生特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生美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ZD280);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发展与中华美学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9)。

[作者简介]刘艳芬,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箱:896262633@qq.com;王雪霏,济南大学文学院文化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寒山著,项楚注:《寒山诗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65页。

②寒山著,项楚注:《寒山诗注》,第766页。

一、生生之源：斯译寒山诗原诗中的意象建构

寒山作为中唐时期隐居天台山数十年的诗僧，其人其诗皆笼罩着某种空灵而不可捉摸的气质，这种空灵而不可捉摸的气质源于佛、道、禅的影响。《四库全书提要》谓："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①]如其所说，寒山诗语言质朴、明白如话、格式自由，既非刻意雕琢之作，亦非精严教化之文，"皆信手拈弄"揭示了寒山诗是一种超越儒、道、佛分野，以禅宗式的直觉思维进行生命任性表达的诗歌。禅宗的思维方式以感性与理性交融的直观思维为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贯穿于佛教徒修行之中，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建构[②]。寒山诗即禅悟式思维的典型产物，不依赖概念推理，而重在直观领悟，将个体生命的顿悟状态直接寄托于自然意象与语句构型之中，展现出高度个体化又深具宇宙关联的精神维度，这样的创作思维方式与同为诗人的斯奈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陈小红指出："目击和感悟取代推理和思辨的倾向是斯诗认识论内核。斯奈德醉心于禅宗，正是因为禅宗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感知认知方式，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轻逻辑思辨重直觉感悟。"[③]

在寒山诗中，禅宗的直觉顿悟方式表现为多个灵动意象的动态共生，形成了鲜活的生生之境，承载了寒山对于生命与宇宙关系的审美表达，并通过斯奈德的选择、翻译，进入到英语语境中。在现存的三百多首诗篇中，寒山诗大致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与佛禅诗五种[④]。而斯奈德并未选择自叙、风俗类作品，而是有意识地选择能融合自然与个体生命、展现生命活泼泼状态的隐逸诗、道教诗与佛禅诗，特别是以山林自然、超世静境为描绘对象的诗作，以求在翻译中表达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美学精神，重现万象互动的生生之境，这种选择本身显示出他对寒山诗所蕴含的生态意蕴的关注和认同。

在斯奈德所选择翻译的寒山诗中，"水""云""天""月""山""岩""石""松""林"等意象反复出现，可大体分为自然意象、居所意象及中介意象三类，它们共同构建了灵动的生生之境。在众多自然意象中，"水"这一意象作为流动、生长与净化的象征，在斯奈德所选的24首寒山诗中共出现8次，构成诗人表达"无滞""有生"宇宙观的重要手段。如"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⑤]（斯11）中的泉水，通过将流动的泉水与静态的月色进行对照，突出了修禅之人心性之清明与寒山中生机之流转，这种强调"流动"与"生成"的意象正体现了宇宙与生命的动态共生。而"云"这一意象则承载禅宗"空""无住"的哲学意味，在斯奈德所选寒山诗中共出现5次。例如《鸟语情不堪》"晴云洗绿潭"（斯13）、《登陟寒山道》"共坐白云中"（斯8）等句中，云卷云舒象征着心境的无执与自由，展现出诗人在精神层面上达成了与宇宙的协调。"天"这一意象更多地隐喻了禅宗的空灵、无碍之境，例如《粤自居寒山》"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斯7）、《寒山有一宅》"六门左右通，堂中见天碧"（斯16），"天"这一意象作为本体的表达，呈现出一种高远明澈、圆融无碍的与人亲和状态。此外，作为佛教中的典型意象，"月"在24首寒山诗中共出现4次，在其中同样承担照耀生命、安顿精神的功能，以明朗空灵的姿态赋予整首诗禅意。如在"寒山顶上月轮孤，照见晴空一物无"（斯22）中，月亮以"月轮孤"

①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9《别集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90-1991页。

②刘艳芬：《诗悟与禅悟——论禅宗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的影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③陈小红：《加里·斯奈德的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

④钱学烈：《寒山子禅悦诗浅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⑤加里·斯奈德著，柳向阳译：《砌石与寒山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下文引用寒山诗均来自本书，本文以序号标注（例如"斯11"）表示在24首中的第几首。

的形象高悬寒山之巅,紧接着“照见晴空一物无”则通过月光的照见能力,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澄明虚空的禅境。

除自然意象外,“山”“岩”“石”等构成了这24首寒山诗中独特的居所意象,共计出现29次,其中“寒山”一词除去代表人名之外共出现20次,带“嶂”字的意象出现3次(如“叠嶂”“青嶂”“沓嶂”),表达岩石的词语出现6次(如“幽石”“石壁”“石岩”等),这些意象不仅描绘出自然地貌的特征,而且更多体现出个体生命的安顿与静修,在营造冷寂幽寒的诗歌氛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月光、云水等流动性、灵动性的自然形象不同,山石所代表的是一种凝固、沉静、孤峭的空间感知——其冷、硬、寂静的特征,却成为寒山身心安顿之所。如“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斯23)一诗中,石岩不仅是肉身栖居之地,更代表了诗人摆脱尘世烦扰后所获得的精神安顿,使石岩成为寒山出世精神的物质载体。而“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斯17)的自适姿态,则展现了诗人隐居岩中、安住当下的生命境界,体现出寒山诗以静制动、动静一如的禅意栖居观。在翻译实践中,斯奈德则是通过使用意译“Cold Mountain”与音译“Han-shan”来区别居所意象寒山与诗人寒山的,这种区分不仅有助于读者准确地辨识语义角色,更揭示了“寒山”一词作为诗人与作为居所意象的双重意义,翻译后的“Cold Mountain”不再只是孤高淡泊的象征,而是蕴含着在苦难、破碎与孤独之中再生的潜能。山石意象不仅是隐逸生活的实写,更体现出诗人在“冷”与“寂”的环境中完成身心的彻底退让与坚守,是禅宗“明心见性”“色空一如”的空间化投影。这类山石意象所构建的冷峭场域,既使寒山诗与唐代其他山水诗有所不同,又进一步强化了诗中生于枯寂、得于虚静的禅悟精神,在生态美学意义上体现了荒寒自然的“负生成力”:即对荒寒与简陋的书写,反激起个体心灵的生命觉醒。

在流动的自然意象与冷寂的居所意象之间,“松”“林”恰处于动态与静态之间,作为中介意象承担着连接其他两类意象、调和生命节奏的作用。一方面,“松”与“林”植根于山石之上,与“居所”意象同属固着空间的一部分,为诗人栖息、安顿身心提供了物质背景。如“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斯7),“林泉”即隐逸修身的实在环境,表现出由居所意象所展开的悠远无尽的自由生命状态。另一方面,“松”与“林”又具有动态属性——可视、可听、可感,是寒山之中激发感官共鸣与情感反应的媒介。如“微风吹幽松,近听声愈好”(斯5)“幽林每吐烟”(斯3)等句中,“松”的风鸣与“林”的烟吐,既是自然界的动态变化,又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内在映照,此时的诗人并非自然的观察者,而是融入其中,体现了中国美学所强调的物我合一、动静一如、生生不息。

尤为重要的是,寒山诗中的每个自然意象与居所意象都并非独立出现,而是交互融合,构成一个呼吸流动的有机生命系统,透视出互生、共生的生生之境。正如“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烟”(斯3),叠嶂的稳定与林烟的流动互生,形构出一个动静互融的生生世界;“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斯13)中静态的山石与动态的日、云、水共生,呈现出超拔尘俗的境界,形象化地展现了诗人寒山在天地之间自由往返的精神状态;“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斯14)中奇妙的物象转化,则体现了诗人于残损与枯寂之境中再生万物的创生想象,使自然呈现出循环不息、化枯为生的生态韵律。可见,寒山诗中的自然意象已超越了传统描写自然的“再现性”功能,而转变为一种富有禅意的“生成性”功能。正是出于一种动态整体性思维,以及对寒岩意象的偏爱,寒山诗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智慧,这也为斯奈德的译介与重构提供了可能的精神共鸣点。诚如斯奈德所叹:“中国诗歌的至高境界,似乎已在人文、精神与自然的三足鼎立中找到了中心点。它以看似质朴克制的表达策略,从对历史的敬畏转向——面对自然时的深深吐纳。”[①]因此作为诗人的斯奈德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砌石与寒山诗》,并慨叹:“每块岩石都是一个词语”“一块溪水冲刷的石头/花岗岩:染就/火与重量的

①Gary S. ,*A Place in Space: Ethics, Aesthetics, and Watersheds: New and Selected Prose*, Washington DC: Publishers Group West, 1995, p. 91.

折磨/结晶与沉积链起炽热/所有变化，在思想中/也在万物中”[①]。

总之，道禅思维的融入，特别是禅宗顿悟的思维方式，正是促使寒山诗“生生”审美转化的前提。所谓“生生”，即宇宙本体之道不断生成、循环、演化的动力机制，其本源可追溯至《易经》“生生不息”与《庄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生成论思想以及道家以物观道、佛禅以色悟空的思维方式。在这一哲学框架下，个体生命被视作宇宙流转中的有机体，物我之间无本质隔离。禅悟的过程本身即为一种生命的生成过程，是个体与宇宙之间的感应、照应与共鸣，因此，禅宗顿悟式的思维方式，是生生美学从哲学本体到审美感受的精神通道之一。寒山诗在意象的构建中实现了对宇宙与生命动态关系的感知与表达，水、云、林、月、岩等意象不再仅是外在景物的写照，而成为生命状态的象征与禅悟精神的载体，并在禅宗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建构出一个动态生成、物我互融、有机共生的意象世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意象从来都不停留于表象，而是与道不可分割的意义结合体，诗歌中的意象更是如此。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中意象具有不断生发、创生新质的特性，即生生特性，“所谓生生特性指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秉持的整体思维、动态观念和不断创生的思想”[②]。寒山诗具有的生生特性，是意象表达的结果和直觉思维的体现，引发了海内外的深度关注和共鸣。斯奈德通过语言重构，将这些具有生生特性的诗歌意象转化为面向西方读者的生态人文景观，是文化奇缘，也是颇具世界意义的文化创生典范。对此，耿纪永分析道：“图画般的汉字进一步构成汉诗中的意象，而每一个意象都可与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产生共鸣”[③]。

二、生生之缘：生态意识的异质延展

斯奈德之所以选择对寒山诗等诗歌进行英译，其动机并非单一，而是文化语境、人生际遇与思想倾向的共同作用。从社会文化语境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正面临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垮掉的一代”掀起对东方文化的集体转向，斯奈德即身处这一反主流文化浪潮之中。在人生际遇上，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汉学家陈世骧，正是在后者的课堂上首次接触到寒山诗，诗中浓厚的自然感与禅意激发了其生态写作与思想的共鸣，成为他走向翻译实践的直接契机。斯奈德在著述《一轮孤月下：当代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导言中提到：“我对写作的兴趣把我领进20世纪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我对大自然和荒野的思考把我带进道家，然后带进禅宗……从陈教授的专题讨论课上，我知道了寒山诗，并且开始作了一些翻译。”[④]更为根本的是，斯奈德自童年时期就形成的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与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他早年即表现出对基督教神学的不适应，转而关注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其后对“地方感”“荒野意识”的持续思考，使他在寒山诗中发现了“栖迟观自在”的东方范式。在三重动因驱使之下，斯奈德将诗歌翻译作为通向东方生态智慧的桥梁，并重构了寒山诗中原有的生态意蕴，使之与当代西方生态意识形成互文性回应。

在翻译寒山诗的实践中，斯奈德的生态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转化，其生态意识不再仅停留于对自在山林的陶醉，而是拓展为一种对更具行动性与社会性的生命野性的召唤：“至于说我象寒山一样‘醉于山’（mountain-drunk），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也许我与其说仅仅‘醉于山’，不如说是‘醉于野’（drunk with the wild），这种情形很奇怪。我越观察就越发现‘野性’也蕴藏在城市和

①加里·斯奈德著，柳向阳译：《砌石与寒山诗》，第51页。

②刘艳芬：《试论梁漱溟文艺美学的生生特性》，《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③耿纪永，赵美欧：《论美国汉诗英译的生态诗学传统：生成与意义》，《中国翻译》，2025年第2期。

④Kent J. , Craig P. , *Beneath a Single Moon :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Boston and London : Shambhala Publicatons, 1991, p. 4.

政府、大学和公司里,特别是在艺术和高级文化之中。"[①]这种从"醉于山"到"醉于野"的现代性转化,既延续了寒山诗物我合一的东方生态智慧,也体现了译者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生态野性的再发现。可以说,正是"山"作为"野性"的栖息之所,使得中西生态思想在诗歌翻译中实现了深层次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古代艺术更强调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在这一背景下,寒山诗则兼具玄远与朴拙,对个体生命则以超越的态度追寻更高层的自在精神,斯奈德则是迎接野性的呼唤,企图从荒野自然中发现生命的新义。

通过对比原诗和译诗,可以见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英译过程是生态思想的现代性转化,也是中西思维方式与审美心理的深层交汇。斯奈德《野性的实践》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与荒野充分共存、创造性共生的文明。"[②]他之所以强调与荒野共存,正是因为其生态哲学强调个体生命应融入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的运行之中。他进一步指出:"神圣指的是那种能将我们(不仅仅是人类)从局限的小我中引领出来,进入山川曼荼罗般的整体宇宙。"[③]这种生命观在中国哲学中亦有共鸣。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指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对于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④]由此可见,尽管寒山和斯奈德文化背景迥异,导致了二者在具体表达人与自然关系时产生差异,但是二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或者说如何安置生命的问题,是不同文化底色之间心灵共振的桥梁。斯奈德在英译寒山诗的过程中,正是借助这一心灵共振,使诗中对自在生命的体悟转化为一种现代语境下对荒野的呼唤与向往,从而完成了寒山诗由古典生态意识到现代生态思想的转换。

这种生态思想的现代性转换,首先体现在翻译过程中对人称代词的增添。不同于对自然景物的描述,斯译寒山诗中多次创造性地加入第一人称代词"I",巧妙将寒山诗原诗天人合一的境界转化为与自然平等的对话。例如在翻译《可笑寒山道》时,斯奈德将"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斯1)译为"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Body asking shadow, how do you keep up?"[⑤]采用增译的方式,添加第一人称"I",描绘了"我"身处幽径不知去往何处的画面,强调作为一种过程性的经历,而非观赏"径"这一景观,在物我合一的意境中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在场感。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I wanted a good place to settle:/Cold Mountain would be safe)"(斯5)"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Morning after morning I don't see the sun/Year after year, not a sign of spring)"(斯9)翻译此二句时,加入了第一人称作为人类生命主体的代言,仿佛与自然进行平等对话。再如在翻译《粤自居寒山》时,寒山以"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斯7)描绘了与自然无间共处的生命状态,而斯奈德则以"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reams / And linger watching things themselves"来翻译这一境界。对于原文中"观自在"的佛禅式内省,斯奈德将其转译为对客体自然"本身"的凝视,流露出海德格尔式的"在场"意识。这种转换体现了他将寒山诗中内敛静谧的生命趣味,转化为一种积极介入自然、呼唤荒野精神的现代生态意识。斯奈德认为"伟大的诗人并非在表达自己,而是在表达我们所有人。要表达我们所有人,就必须超越自我"[⑥]。译作中对"I"的添加,除了符合读者群的认知方式,也是从人的视角出发,使得景中有我,景我合一,是对寒山诗中的

①区鉷:《加里·斯奈德面面观》,《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②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Berkeley: North Point Press, 1990, p. 6.

③Gary Snyder,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Berkeley: North Point Press, 1990, p. 94.

④牟宗三著,罗义俊编:《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⑤Gary S., *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Toronto: Harper Collins Canada Ltd, 1996, p. 39. 本文所引斯奈德英译寒山诗均来自此书。

⑥Gary S., Mclean W. S., *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 Talks, 1964—1979*,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0, p. 79.

生态思想所进行的西方现代性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耿纪永指出，斯奈德在译诗中常有意省略第一人称“I”，从而体现生态批评所强调的“去人类中心主义”[①]。这一观察确实契合斯奈德部分译作中的语言策略，尤其是翻译王维、刘长卿等诗人诗作时的译法。然而，本文所考察的英译寒山诗，尤其是涉及描述山林、栖居内容的诗，则显示出另一种主体凸显的倾向——即斯奈德通过第一人称“I”的反复加入，使隐逸者寒山成为现代个体的理想投射。这种翻译方式的差异恰恰体现了斯奈德所倡导和实践的生态诗学的张力：中国生态智慧趋向主体消隐，西方环境美学注重物我共融中的主体生成，生态诗学则强调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实践中通过对原文诗句结构的改变，利用寒山诗中具有生生特性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对其生态意蕴进行转化，增加人类的在场性以增强原诗的故事性。斯奈德选择翻译的寒山诗虽然不同于现代白话诗，但在美国新诗运动意象派的影响下，斯奈德的译文却带有自由体诗的痕迹，例如抽去意象之间的谓语动词、采用多个名词短语并列的词句结构、通过堆叠跳跃性的意象拼凑出完整的画面等。例如将《重岩我卜居》“重岩卜我居，鸟道绝人迹”（斯2）翻译为：“In a tangle of cliffs I chose a place—/Bird-paths, but no trails for me.”斯奈德的译文省略了谓语动词“绝”，同时用转折词but连接两个并列的名词短语，突出了“鸟道”与“人迹”的对比，在构筑诗歌有机整体的基础上，发挥了读者直觉想象的作用，将孤立的意象连接为有机的整体；同时添加宾语me，将原诗中幽径人迹罕至特点的描述，转化为以“我”为主人公的叙述，呈现出故事性。

最后，斯奈德在翻译实践中还善于运用拟人手法，赋予自然万物人类的知觉。如果说寒山诗倾向于将自然作为整体在诗歌表现出浑然无为状态的话，那么斯奈德则倾向于把自然作为有生命的主体，以荒野意象为载体，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例如在《登陟寒山道》中，将“溪长石磊磊，涧阔草蒙蒙”（斯8）译为“The long gorge choked with scree and boulders, /The wide creek, the mist-blurred grass.”原诗并没有明确说明溪水因石头多而拥挤的状态，译作中则使用choke来刻画溪水被石头拥挤的情态，因为choke一词本身有“使窒息、阻塞”的意思；牛津词典对choke的释义为“to be unable to breathe……”译诗由此将溪水中石块密布的景色转化为溪水被密石遏制住了“呼吸”，赋予溪水知觉，将读者带入流水的视角，别有新意。同样在翻译“松鸣不假风”（The pine sings, but there's no wind）（斯8）时，将风穿过松林发出了声音比喻为松林的吟唱（sing），不仅避免了生硬翻译“假（凭借）”字，同时创造性地赋予松林生命，将禅理融于现代意趣，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又不断生发出新意。

通过斯奈德的译介，寒山诗不仅为20世纪在都市异化与精神虚空中成长的美国青年人提供了新的心灵栖居之地，还促使他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在阅读寒山诗的过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其诗的生态意蕴，亲近并体悟自然，将个体生命提升到与天地相参的艺术境界，感受“无碍”的精神自由，从而实现对功名利禄、荣辱得失的超越。这种超然的审美意趣，恰好与西方青年人在反叛与逃避现代性危机中所寻找的另类生存智慧不谋而合，从而让美国“垮掉的一代”将中国唐代的寒山视为跨越文化和时间藩篱的知音。

总之，斯奈德英译寒山诗所体现的审美趣味，正是“不断生成”“逆境求生”“荒野生机”的现代性表达。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转译语义信息，而是在审美文化层面完成了一种再创造。他将东方诗中淡远、内省、自足的“自在生命”趣味转译为更具荒野感、冒险性与行动性的现代生态意趣，正如他在翻译“栖迟观自在”（斯7）时所使用的“And linger watching things themselves”，更强调感知世界的主动性与外向性。这种转换不仅是审美习惯的适应，更体现出他对寒山诗生态意蕴的当代表达——即生命力并非静态安稳的守成，而是不断进入自然、唤醒自然、激活生命的动态过程。正如耿纪永强调的那样：“一些译者受社会背景、诗学意图等诸多文本和非文本因

①耿纪永：《为濒危的世界翻译——生态批评视阈下斯奈德唐诗英译的意义与价值》，《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素影响,有意识地利用汉诗中的自然观和'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通过选择、改写、推介,来阐释或建构出一种生态诗学面貌,并借此助推当时的诗学变革和文化思潮。"[①]如果说生态诗学是建立在西方生态立场的话,那么生生美学则更深植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生不息之生发逻辑,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时,正是通过词汇的再编码、意象意趣的转换,不断推动原诗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生发、流动,这种过程性生成,可以见出斯奈德的英译并非顺应西方,而是借助异质语言展现了寒山诗中的生生内蕴,从自在到自为,正是文化生态领域生生美学精神的体现。

三、生生之境:跨文化语境中的生态再生

在斯奈德的翻译实践中,不仅将寒山诗中的生态意蕴进行了现代性转化,更重要的是,原诗中所蕴含的意境在其译文中得以重塑和再生。通过改写意境的底色,斯奈德传递出寒山诗中原有的生生精神,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更具张力、更为野性、更贴近现代生态意识的生命表达。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增强了原诗的生态感染力,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也激发了译诗中蕴含的生命活力。

与寒山原诗中所营造的幽冷、孤峭、空灵的意境不同,斯奈德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这些自然意象呈现出荒野生命的鲜活与流动,把"静观自足"的东方气质转化为"动态介入"的西方生态感知。寒山隐居天台山中,他以一种超越世俗纷扰的姿态静观尘世众生,他追寻的是宁静纯粹、不受羁绊的精神自由。而斯奈德则投身环保运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为"我们在社会和生态方面的生活状况非常严峻",乐观地希望通过诗歌可以"让我们爱这个世界"[②]。寒山诗中以"冷寂""荒寒"为特征的意象,表现了其超然物外、逃避尘俗的隐逸精神;而斯奈德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前述增添人称代词、改变原文诗句结构、拟人的翻译方法,将这些意象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辽阔荒野之景,折射出他对万物平等及荒野审美的思考。这种转化体现了生态语境下审美意义的重构,也是寒山诗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得以激活、生发新质的关键。正是由于斯奈德与寒山在时代文化背景、审美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使得斯奈德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拓展了原诗的内在生命空间,他以一种积极介入自然、强调人与荒野共生的生态视角,将寒山诗中隐逸而冷寂的生命意境激活为更富现代生态意义的荒野之美,从而使寒山诗的生生特性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审美张力。

首先,斯奈德在还原诗歌原意的基础上,也将自我精神追求融入译文中,在体悟原诗意境的基础上,通过对意境特征的转化,使寒山冷寂逍遥的意境变得生机盎然。《重岩我卜居》"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斯2),"白云"因流动而"环抱"幽石,形成氤氲的意境,斯奈德译作"White clouds clinging to vague rocks"不仅传达出原句的静谧,也用clinging这一富有情感色彩的动词,展现出云石之间的柔和亲密关系。斯奈德首先用clinging作状语,修饰白云的状态。不同于affix/cover/paste等英语词汇所表达的"附着"意义,clinging的原型动词cling常常带有感情色彩,有"依恋"之义。牛津词典对cling的释义除了to hold on tightly to sb. sth. 之外,还有to stay close to sb, especially because you need them emotionally,意为"由于情感原因而依赖",还原了原作云中有石、云石相依的自然状态,更营造了云石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此外,vague这一形容词的使用,巧妙地译出山石由于云雾的笼罩而若隐若现的意境,改写了"幽"字所表达的冷寂。斯奈德通过对动词cling语义的再编码、形容词vague的引入,将"幽"字的冷寂转化为更富生生意蕴的自然亲和气息。这种处理正体现了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诗意境的再创造,是其真正理解中国古典"生生论诗学"并予以跨文化现代表达的体现。"生生论诗学"是曾繁仁在《唐诗:生生论诗学的集中呈现》一文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唐

①耿纪永,赵美欧:《论美国汉诗英译的生态诗学传统:生成与意义》,《中国翻译》,2025年第2期。

②万海松编译:《诗歌的艺术——加里·斯奈德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02年第5期。

代诗学所具有的不仅追求自然的描摹，而且重视在有限的意象中生成无限意境的审美风尚，这种诗学存在于诗歌创作、阅读和批评过程中所构建的流动的、生生不息的诗性空间之中[①]。斯奈德的翻译，改写了寒山诗中意境原有的“冷寂荒寒”的特征，并赋予其更为鲜活生动的审美特征，在西方语境中呈现了寒山诗的生生特性。

其次，斯奈德的译介更注重激发读者的生态想象，拓展了寒山原诗的诗意空间，从而生发出新的审美韵味。在英译《可笑寒山道》中，斯奈德将“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斯1）一句，翻译为：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他省略翻译“泣”这一带有悲观色彩的动词，而是改用bend与hum两个谓语动词，形象地刻画出草被露水压弯、松林中环绕的风声这两个景象，赋予云石生命，从而合二为一形成完整的山林，还原了山涧草甸在风雾中缥缈的意态。可以看出，斯奈德通过词语的动感处理和情感语义的再编码，不仅削弱了原诗中的萧瑟情绪，更是唤起了读者对万物有灵、生生不息的生态想象。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如把《寒山多幽奇》“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斯14）一句翻译为：On the bare plum，flowers of snow/ On the dead stump，leaves of mist. 英语中用名词短语作地点状语来塑造梅与木的状态，引发读者脑海中对原诗画面的空间想象，同时弱化了“凋”“杌”等对衰败荒寒景象的形容，从而构建出梅花如雪般垂落的冬日盛景。斯奈德对“凋”“杌”等字的处理，不再停留于物象的表层，而是赋予其在时间与生命中的流动性，与原诗相较更具有生机活力；译文中的“fresh and live”不只是描述自然状态的改变，更象征着生态视角下自然生命的再生潜能，这也体现了他将西方荒野生命转化为东方生生之美的独特路径。

最后，斯奈德在翻译实践中还有意地在“残生”之处发现新的生命力。所谓“残生之美”的精神，与道家思想对艺术的影响有关，正如曾繁仁指出的那样：道家美学中常以“畸人”“散木”来表现生存智慧，即表达出“知白守黑”幽暗处的生命哲学[②]。斯奈德从荒野之中探索生命的不稳定、不完满与持续生成的可能，这种对生命韧性与自然生成力的关注，正与道家的残生思想相契合，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中。在他笔下，荒野成为生命濒危边缘的一处生生之地，象征着自然不断生成、自我更新的可能性。如将“凋梅雪作花，杌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斯14）”一句翻译为：On the bare plum，flowers of snow / On the dead stump，leaves of mist. /At the touch of rain it all turns fresh and live/ At the wrong season you can't ford the creeks. 斯奈德用bare、dead强化残败之景，又通过“flowers of snow”“leaves of mist”唤回生命的鲜活气息，从而构建出一种由死转生的动态循环，体现了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生成逻辑。

综上，寒山诗中冷寂的荒寒意象为斯奈德提供了开放的视角，在引导读者接纳万物平等的同时，达成了生命的自由与逍遥。斯奈德在体悟原诗意境的基础上改写了意境的情感底色、激发了读者的生态想象、注重刻画残生之处的生机活力，企图在灵山动水的生态互动中给予人类生命的颤动，何尝不是一种“张之于意，思之于心”的艺术创造过程。因此，斯奈德的翻译实践不仅是语言与意义的重构，更是一次激活原诗生命感知的文化创生实践，他以现代生态意识进入寒山诗“冷寂荒寒”的东方意境中，赋予其对“辽阔荒野”的生命体悟，这种转化本身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对生态意识的激发和重塑的动态过程，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生生特性。在现代西方学界中，生态批评、生态诗学等都强调文本中的自然环境再现、语言结构的生态性，其中生态诗学尤其强调语言的生成性和生态机制。然而，这类理论在分析中国古诗的意境之美时，难以全面涵盖其深层生命观念，而“生生美学是具有中国形态的生态美学”[③]，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生成性、互感性与精神通透性，能

①曾繁仁：《唐诗：“生生论诗学”的集中呈现》，《东岳论丛》，2021年第12期。

②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及有关问题——兼答杜学敏有关生态美学的几点质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③韩清玉：《生生美学：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次尝试》，《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够揭示自然界万物流动、生成不息的本体逻辑,在分析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更为适恰。寒山诗特别是斯奈德所选择翻译的诗歌,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其中所内蕴着的动静一如、刹那永恒的生态意蕴正是来自禅宗顿悟思维方式的影响。对此,曾繁仁也多次提到禅宗顿悟是"刹那间生命领悟或生命颤动",是产生"境外之境"的关键,从而认为唐代"意境论诗学"是"生生论诗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意境论诗学"也正是"生生论诗学"的最高形态①。

总之,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时通过语言转化激活了原诗意象中的生生特性,从而对原诗"冷寂荒寒"的意境进行了动态重塑和创生,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不仅作为媒介参与生态意象的再编码,更作为生成性力量,唤醒了原诗中潜藏的具有"辽阔荒野"特质的野性生命活力。正是在这种文化的传递和转化中,体现了不同文化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所做的相近的理解,从而在跨文化层面激发出寒山诗新的生命活力。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危机,并非源于生态系统自身的运作方式,而是源于我们伦理体系的运作方式。要度过这场危机,不仅需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更需要理解这些伦理体系,并运用这种理解对其进行改革。当然,历史学家与文学学者、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无法直接进行改革,但他们能助力增进这种理解"②。如果说,寒山诗是让人"准确地理解我们对自然的影响"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斯译寒山诗则促使人类反思生态"伦理体系的运作方式"并"对其进行改革",是寒山诗所蕴含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创生性发展。

四、结 语

受禅宗直观顿悟的思维方式与意与象合的艺术呈现方式的影响,诗人寒山在其隐逸诗中构筑起充满生命律动的生生之意象,诗中流动、空灵、冷寂的自然意象承载了个体生命与宇宙间的深层共鸣。美国当代诗人斯奈德敏锐地捕捉到寒山诗中潜在的生态意蕴,并借助现代的生态思想对其审美趣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诗中内敛自足的自在生命扩展为富有社会性、具有荒野审美特征的现代生态表达。在此基础上,斯奈德对原诗冷寂、荒寒的意境进行改写与转化,激活了荒野审美中的生命活力,不仅增强了寒山原诗的生命力,也实现了其在西方语境下的再生和创生,凸显出寒山诗超越时空的生生特性。

斯奈德对寒山诗的翻译,不仅传达出中国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融入了西方现代对荒野生命的理解与呼唤。寒山诗在斯奈德笔下实现了这种从东方哲学到西方生态意识的精神生长,展现出跨文化语境中语言与自然共同激发生命意义的可能,诗歌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迁移和意义的重建,更是跨文化生态审美的创新实践。在斯奈德的创造性翻译实践中,寒山诗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进入西方语境,引发了现象级讨论,是当代文化交流的奇迹,寒山诗的生态意识和哲学思想也得以跨越时空和文化的界限,与现代西方读者产生共鸣。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和互动,不仅是寒山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现代生态批评的结合,还为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翻译学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同时,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斯译寒山诗在20世纪美国的传播热,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东方的生态哲学智慧,而且也促使中国学者从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出发,重新思考生生论诗学在当代表达中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李　炜]

①曾繁仁:《生生美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页。

②Donald W.,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